

政治发展与治理研究系列丛书

主编 葛荃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基地重点项目

公共政策导向的 生活质量评价研究

邢占军 等 著

GONGGONG ZHENGCE DAOXIANG DE
SHENGHUO ZHILIANG PINGJIA
YANJIU

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基地重点项目

政治发展与治理研究系列丛书

山东大学“211工程”资助项目

公共政策导向的生活 质量评价研究

邢占军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政策导向的生活质量评价研究/邢占军等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 5

ISBN 978-7-5607-4309-7

I. ①公…

II. ①邢…

III. ①政策科学—影响—生活—质量—研究

IV. ①C913.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5354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720×1000 毫米 1/16 19 印张 338 千字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政治发展与治理研究系列丛书

编委会

主 编 葛 荃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学玉 王建民 王韶兴 方 雷

孔令栋 刘玉安 曹现强 崔桂田

葛 荃

总 序

2011年是山东大学建校110周年。作为中国近代第二所官办大学——“山东大学堂”，山东大学的积累之悠久，底蕴之深厚，勘可感慨系之。

晚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直隶总督袁世凯奏呈朝廷并由光绪帝御批的《山东大学办学章程》中，就山东大学堂的办学宗旨做了这样的阐述：

公家设立学堂，是为天下储人才，非为诸生谋进取；
诸生来堂肄业，是为国家图富强，非为一己利身家。

在中华帝国行将就木的20世纪初叶，在东渐之西学纷至沓来的近代中国，袁氏奏呈的“办学章程”却有着某种意义上的传承性与超越性。愚以为，袁氏立意“天下、国家”，绝非其偶然心念一动，在这一理念的背后，当是数千年孔孟儒学传统文化之精粹的蕴聚与支撑。从而，为了“天下国家”，而非“一己进取”的办学理念，在那个中华羸弱、列强环伺的年代，越发彰显着山东大学的历史使命与民族责任，成为山东大学立足与发展的价值基石。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山东大学在伴随着时代动荡、社会变迁的百余年行进途中，尚能安然把握着方向与节奏，使之得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均能汇聚时代的学术精英，渐次积淀了丰厚的学术内涵和大学文化底蕴。迄今，亦能风雨无阻，依然跻身于全国高校第一方阵的前排。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是山东大学百余年行程过半的时候才得以组建的，如今业已年过而立。作为全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在山东区域的一方重镇，其或发展或进步或逡巡或蹒跚，总会令人瞩目，引人关注。作为山东大学不可割舍的肌体，政管学院之举手投足、一笑一颦，往往事关全校的布局与发展，甚或波及百年山大之盛誉。于是兹事体大，吾侪不敏，遂以

2 公共政策导向的生活质量评价研究

《论语·泰伯》之教训为警醒：“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此，于2009年即谋划聚合全院教师，协同努力，做一学术振兴。列为其重要举措之一，即出版学术著作若干，自成一系，冠名曰“政治发展与治理研究系列丛书”，为的是既能涵盖学院诸多学科，又能与主体方向不离不弃——为了推动山东大学政治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而积累学术内涵；同时，也是为了在这样的操练过程中，不断推出青年才俊。在学院团队整体发展的同时，教师个人也能加快进步与成熟，实现个体与整体的同步迈进。

我们肩负着学界前辈的成就与希冀，我们延续着百年山大的底蕴和盛誉。在当下学术与世俗混而难分、盛名与实学真伪莫辨的“转型时代”，我们当以山大人的真诚与辛劳，为学界奉上这组系列文字，为的是弘扬学术，以文会友。抑或移易风俗，振兴我山东大学之政治学学科。

是为序。

嵩荟

2010年3月

于济南府环东佳苑

目 录

第一章 生活质量评价的研究与实践	(1)
一、生活质量概念的演变与理论发展	(1)
二、国外生活质量评价研究与实践	(9)
三、国内生活质量评价研究与实践.....	(17)
第二章 生活质量综合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试	(20)
一、生活质量综合指标体系的理论构建.....	(20)
二、客观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	(27)
三、主观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	(42)
第三章 健康与基本生存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试	(78)
一、与基本需要相关的理论研究与评价实践.....	(78)
二、健康与基本生存质量指标体系的理论构建.....	(87)
三、健康与基本生存质量指标分析与筛选	(101)
四、健康与基本生存质量指标权重确定与综合评价指数的形成	(110)
五、健康与基本生存质量指标体系的测试与应用	(115)
六、相关公共政策建议	(119)
第四章 经济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试	(123)
一、经济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研究综述	(124)
二、经济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理论构建与指标设计	(127)
三、经济生活质量指标的实证筛选	(139)
四、指标权重确定与测试应用	(145)

2 公共政策导向的生活质量评价研究

五、提高我国居民经济生活质量的政策建议	(155)
第五章 生存环境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试	(158)
一、生存环境质量评价相关研究综述	(159)
二、生存环境质量指标体系的理论构建	(164)
三、生存环境质量指标分析与遴选	(176)
四、生存环境质量指标权重的确定	(182)
五、生存环境质量指标体系的试测与应用	(188)
六、公共政策建议	(197)
第六章 文化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试	(202)
一、文化生活质量研究综述	(203)
二、文化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理论构想与指标体系设计	(208)
三、文化生活质量指标的统计分析和遴选	(219)
四、指标权重的确定及综合评价指数的形成	(226)
五、文化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试测与应用	(231)
六、文化生活质量评价结果的政策分析及建议	(238)
第七章 社会生活质量部分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试	(241)
一、社会生活质量评价相关研究综述	(242)
二、社会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构想与设计	(245)
三、社会生活质量指标的筛选	(259)
四、社会生活质量指标权重的确定	(269)
五、社会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试测与应用	(274)
六、社会生活质量评价结果的政策分析及建议	(281)
主要参考文献	(284)
一、外文文献	(284)
二、中文文献	(287)
后记	(293)

第一章 生活质量评价的研究与实践

一、生活质量概念的演变与理论发展

生活质量研究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当时作为一个社会学指标使用。较早的相关研究见于 1933 年胡佛研究中心 Ogburn 主编的《近期美国动向》,该书讨论和报告了美国生活各方面的状况和走势。^① 美国经济学家 Galbraith 首次对生活质量概念进行了界定,在他看来,生活质量是指人们在生活舒适、便利程度以及精神上所得到的享受或乐趣。^② 自此以后,生活质量逐渐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并得以迅速发展,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生活质量进行探讨,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各具特色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

德国著名生活质量研究者 Noll 按照当前生活质量研究的理念和框架侧重点不同,将迄今为止生活质量研究分为个体生活质量(Individual Quality of Life)和社会生活质量(Societal Quality of Life)两大类。^③ 个体生活质量主要关注个体层面的生活环境和感受,主要的界定方法有:经典的划分方法,即将生活质量划分为客观生活质量维度和主观生活质量维度;荷兰学者 Veenhoven 根据“质量”的具体内容,从生活的机会和结果以及外在和内在质量这四个维度出发来界定个体生活质量;综合性的定义,一定程度上可以讲是将上述两种概念进行整合,制定具体的生活质量定义和目标,从而指导生活质量指

^① US President's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al Trends, *Recent Soci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cGraw-Hill, 1933(2).

^② JK.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8.

^③ HH. Noll, *Konzepte der Wohlfahrtsentwicklung: Lebensqualität und ‘neue Wohlfahrtskonzepte’*. WZB-Discussion papers, Berlin: Science Centre, 2000.

2 公共政策导向的生活质量评价研究

标体系的构建。社会生活质量则强调那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体生活质量的社会因素,比如平等、公平、自由或团结等,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的福利分配和群体关系,目前较有代表性的理念有社会凝聚、可持续发展、社会质量等。

(一)个体生活质量

1. 个体生活质量的经典理论

对个体生活质量的研究,从起源上可以大致分为源于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生活水平和源于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生活质量。两种模式对于生活质量的界定的差异在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关注客观生活条件,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则强调主观生活幸福感。之所以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理念,是因为各自福利政策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不同。

(1)客观的生活质量。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对于生活质量的理解,是建立在福利被定义为“个人对于资源的需求是通过对资源以及自身生活条件的直接和有意识的控制来体现”^①基础之上的。这些“资源”包括收入、资产、教育、知识、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等,它们都很适合运用客观指标进行评价。至于生活质量的主观方面,此模式认为它受到包括个人的需求水平、环境适应程度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与实际生活条件存在差异,且稳定性程度不高,所以不适合用来衡量社会福利并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依据。

此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Amartya Sen 提出的“能力”(Capability)概念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生活质量概念非常相似。这一理论关注个人的能力并认为福利政策的目标是提高个人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资源”概念与“能力”概念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将人看做是目的而非手段,即认为个人是可以积极并有意识地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偏好主导自己的生活,而不管是资源还是能力,都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2)主观的生活质量。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相对的是美国式的生活质量概念,该模式认为福利应该根据个人自己评价的需要的满意度来定义。根据这一观点,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追求人们的主观生活质量而不是客观生活质量。具体来说,主观生活质量可以分为认知层面“满意度”和情感层面的“幸福感”。当前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运用了主观生活质量的概念,根据本国和地区的特点,构建出了幸福感指标体系并发布幸福指数。

^① R. Erikson, “Descriptions of inequality: The Swedish approach to welfare research,” in M. Nussbaum and A. Sen (eds.), *The Quality of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72-73.

(3) 主客观综合的生活质量。经过多年的发展,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的定义都已深入人心,并且呈现出整合的趋势。目前最能够体现这种趋势的是基本需要概念和德国的生活质量概念。

基本需要模式是 1972 年学者 Allardt 通过“斯堪的纳维亚福利模式的比较性研究”这一课题提出的新的生活质量概念。在他看来,斯堪的纳维亚“资源”模式的生活质量概念局限性很大,因而提出运用 Galtung 的基本需要概念整合原来的经典生活质量概念中的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① 按照这一理论,生活质量就可以定义为物质需要(having, 即物质性的客观需要)、爱的需要(loving, 即对于社会关系的需要)和自我存在的需要(being, 即融入社会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需要)的综合概念。这样在具体的指标选择上就能够涵盖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内容。

德国研究者 Zapf 提出了综合的生活质量概念,尝试通过不同的生活领域将客观生活质量(如工作条件、健康状况、社会关系等)和主观生活质量(如对具体领域客观生活条件的评估以及主观体验等)两方面的内涵结合起来。^② 综合这两方面内容进行评价后就可得出生活质量的四种结果:好的客观生活质量与好的主观生活质量相结合,就是幸福(well-being);好的客观生活质量与差的主观生活质量相结合,是不协调(dissonance);差的客观生活质量与好的主观生活质量相结合,是适应(adaptation);差的客观生活质量与差的主观生活质量相结合,则是被剥夺(deprivation)。

总的来说,经典的生活质量概念经过多年的发展受到了各国研究者的关注,其包含的客观和主观理念已经逐渐演变为生活质量的一些重要测量方法(例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在各种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得到广泛应用。

2. 个体生活质量的“四维”界定理论

荷兰学者 Veenhoven^③认为,经典的主客观生活质量概念虽然简洁明了,但是客观和主观的区分只是从生活质量的外在内容而不是从其实质意义出发,所以这种概念系统并不能解释太多的东西。举例来说,收入状况可以进行客观评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收入对于生活质量的价值就很重要。所以,他主

^① E. Allardt, "Having, Loving, being: An alternative to the Swedish model of welfare research," in M. Nussbaum and A. Sen (eds.), *The Quality of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88-94.

^② H. H. Noll, "Towards a European system of social indicator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system architectur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2(58), pp. 51-52.

^③ R. Veenhoven, "The Four Quality of Life: Ordering Concepts and Measures of the Good Lif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0 (1), pp. 1-39.

张从生活机会和结果、外在和内在质量这几个维度排列出四个方面的生活质量内涵。

生活机会(life chances)和生活结果(life results):前者指的是个人生活所需要的客观和主观条件,为输入条件(如营养的摄入);后者则是借助各种条件取得的各种效益,是输出条件(如健康的状况)。外在质量(outer qualities)和内在质量(inner qualities):前者主要指外在的环境因素,而后者为个人本身的因素。将这四个维度进行综合后,就可以得到表 1.1 中的四个方面的生活质量内容。生活质量这四个方面的具体含义为:

(1)环境适宜度(livability of the environment):指的是包含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的外在环境所提供的客观生活条件。

表 1.1 个体生活质量的“四维”理论

	外在质量	内在质量
生活机会	环境适宜度	个人生活能力
生活结果	客观生活效用	主观生活评定

(2)个人生活能力(life ability of the person):指的是个人应对和处理生活问题的能力,与森的“能力”概念相似,包含了身心健康、知识技能水平和生活方式等内容。

(3)客观生活效用(objective utility of life):指个人所能取得的最终结果,并且是客观方面的,包括对于亲人(如抚养子女)、社会(如成为合格公民)和整个人类(如创造某个发明)所能起的作用。

(4)主观生活评定(subjective appreciation of life):主要是个人本身对于生活的评价,包括整体及各个领域生活的满意度、主要情绪状态的评价等。

与经典的生活质量理论相比,这一“四维”理论侧重于从生活质量的输入条件和输出结果的角度进行定义,将原来的客观生活质量部分用环境适宜度、客观生活效用和个人生活能力概括,而主观生活质量则作为生活结果的一个部分,可以说更加具体地分析了生活质量的概念。此外,Veenhoven 还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各个领域的生活质量内容,如经济、社会等方面,同样也得到了直观具体的结果。

3. 综合性生活质量

这一类生活质量定义以“Wellbeing”为关键术语,通过以追求民众的各方面生活的幸福状态为目标,将影响这一幸福状态的所有因素整合起来,既包含了客观和主观生活质量内容,也有生活机会、结果及内在和外在质量的内容,

同时都与具体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构建实践紧密关联。

这类定义的概念框架也主要包含主观生活质量和客观生活质量两个方面。其中主观生活质量与经典生活质量概念类似,分为情感层面和认知层面;客观方面分为身体、物质、情感、社会、发展和活动这几个方面的幸福状况,与经典生活质量概念相比,客观方面的内容更加强调与主观方面的联系,即只保留那些与主观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客观生活质量内容。目前很多发达国家,如英国、荷兰、加拿大等已经采用这一生活质量概念,而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也正利用“Wellbeing”的概念开展生活质量工程。

英国政府生活质量工作团队为了将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目标纳入到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从2005年11月开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们调查了不同政府部门对“Wellbeing”的定义,并于2006年得出了一个综合的结论,由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局(DEFRA)将其运用到2007年版的可持续发展监测指标体系中。他们将“Wellbeing”定义为:一种积极的身体、心理和社会状态,而不仅是不存在像痛苦、不适合无能这样的感受。这种状态只有当个体的一些基本需要获得满足时才能达到,这些需要是指个体会产生一种使命感,即他们觉得能够实现主要的个人目标并能融入社会。而且,这种状态的提升有赖于包括支持性人际关系、强大和有包容性的社区、健康的身体、薪酬稳定的职业、有益于健康并有吸引力的自然环境,以及财产和人身安全在内的客观条件。^①英国的这一定义主要从公共政策出发,虽然关注点是个体的生活质量,但是已经涉及了包括可持续发展、社会凝聚等在内的社会层面的生活质量,体现了英国的社会和民众个人共同发展的特点。

荷兰政府统计局于1995年开始陆续实施了幸福指数工程^②、生活质量调查等项目,逐步确定了“Wellbeing”的概念模型,其主要内容包括五个部分:(1)各个领域的客观生活质量;(2)各个领域客观生活质量的满意度评价;(3)社会功能的质量;(4)宏观社会环境的主观评价;(4)整体幸福感。荷兰对生活质量的理解,也整合了主观和客观生活质量的内容,并注重考察社会层面的生活质量内容,满足了国内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体现了国际生活质量研究的发展趋势。

由加拿大学者和一些国际专家联合组成的咨询委员会指导进行的加拿大

^①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UK): The well-being measurement in the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5. <http://www.defra.gov.uk/sustainable/government/what/priority/wellbeing/policy-context.htm>.

^② G. Gringhuis & A. Israëls, “Analyzing Well-being in Relation to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pulation,” *Netherlands Official Statistics*, 1999, (14), pp. 28-34.

6 公共政策导向的生活质量评价研究

幸福指数指标体系(Canadian Index of Wellbeing ,CIW),所使用的幸福概念同样包含了综合性的内容,该体系共分为八个部分:民主参与、社区活力、教育、环境、居民健康、休闲和文化、生活水平、时间运用。其理念着眼于整个国家层面,立足加拿大自身的文化价值观来对加拿大民众的生活质量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二)社会生活质量

社会生活质量的概念兴起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初期,关注的是整个社会层面的福利状况而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目前的主要概念有更具全面性的人类发展概念和社会质量概念,还有关注特殊福利领域的社会排斥和社会资本概念。这些概念之间包含着相互交叉的内容,而其中的一些观点同时也是个体生活质量讨论的内容,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概念是对个体和社会生活质量内涵的全面整合,体现了生活质量研究领域随时代发展所做出的理念拓展和创新。

1. 宜居程度理论

适宜居住度(liveability)的概念也是由荷兰学者 Veenhoven 提出的,作为描述社会性能的法则,Veenhoven 将其定义为“能够为满足公民的基本需要和发展提供必需条件的水平”^①。这个定义在操作化测量中分为输入指标(input indicators)和输出指标(output indicators)两个部分:前者是社会为了满足公民基本需要和发展所提供的生活条件,如财富、政治自由、社会公平、教育等,后者是人们最终能在社会当中达到的“兴旺”(flourishing)程度,即健康的身体和对于生活的积极评价。如果把提高个体生活质量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那么作为社会好坏程度评价的适宜居住程度便是与个体生活质量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我国,适宜居住程度的概念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当前的城市建设中。2005 年 7 月,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宜居城市”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之后,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 100 多个大、中、小城市都提出了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中国城市科学研究院“宜居城市”课题组组长罗亚蒙对“宜居城市”作出的一般定义是:“宜居城市,是指宜居性比较强的城市,是具有良好的居住和空间环境、人文社会环境、生态与自然环境和清洁高效的生产环境的

^① R. Veenhoven, “Happy Life-expectance: A Comprehensive Measure of Quality-of-life in Nation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6, (39), p. 7.

居住地。”^①在各地的具体操作中,宜居概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归纳起来主要包括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公共安全度等方面的内容。

2. 社会凝聚、社会排斥、社会资本理论

这三个概念是密切相关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凝聚(social cohesion)可以囊括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当内容重点落在减少差别、不平等和社会分化时,就是社会排斥;而当关注目标在于加强社会融合及生活成员义务的所有方面,就是社会资本。总体来说,社会凝聚关系到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涉及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个人、集团、组织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融合、团结和稳定的价值,会直接影响个人生活质量水平,是对传统生活质量概念必要和重要的补充。

以东南亚国家的生活质量研究实践为例^②,社会凝聚等概念是其关注的重点。具体来说,体现在强调社会关爱、关注弱势群体和解决社会价值冲突等社会层面的内容,通过政府和社会加强这些领域的投入力度,来提高各个阶层民众的生活质量水平,反过来也提高社会的融合度,促进国家团结。

3. 可持续发展理论

上世纪 90 年代,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成为最受关注和最重要的社会发展模型,该理论解答了怎样在社会发展与和谐之间保持平衡的问题。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具体来说,可持续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区别的维度:经济、环境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在不损害其最终依赖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尤其是协调好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社会可持续发展则强调改善社会条件以满足当代人和后代人都能追求福利的目标。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理念拓展了生活质量的内涵,这一理念在原来强调提高现代人生活质量的基础上,加入了保证子孙后代生活质量的内容。

英国伦敦政府可持续发展委员制定的伦敦市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就是直接通过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促使政府和市民采取具体的行动,对生活质量加以界定并规范相关政策和行为的实施,其具体的概念框架为:政府和市民要对他们可能会影响他人和环境的行为承担责任,对于多元文化和环境要采取尊重的态度,此外还要合理谨慎地利用资源,从而得到积极的生活效用和结果。从

^① 胡娟、李星明:《建设武汉市宜居城市研究》,载《武汉建设》1999 年第 2 期。

^② 参见周长城《东南亚国家的生活质量研究》,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 年第 6 期。

这个由责任(responsibility)、尊重(respect)、资源(resources)和结果(results)组成的“4R”框架不难看出,伦敦对生活质量的界定实质上强调“只有将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有机结合的生活,才是真正意义上高质量的生活”^①这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4. 人类发展理论

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概念最初是由 Miles 在 1985 年提出的,而后经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应用,并融合了森的理论,逐渐扩大其影响力。^② 最早的人类发展概念包括两个维度:人们能力的形成过程(即人们的选择性扩大的过程)和人们使用他们能力的方式(即人们达到的生活质量的水平)。经过多年的发展,人类发展概念陆续增加了新的维度,如人类自由(human freedom)、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增权和参与(empowerment and participation)、人类安全(human security)、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从以上各种维度可以看出,人类发展的概念以新的理论解释了个体层面的生活质量(即将人看做是发展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同时又吸收了人类自由、可持续性、人类安全等社会层面的生活质量内容。与以往的生活质量概念相比,这一界定更加全面和完整。人类发展概念主要体现在每年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理论也在不断创新。

5. 社会质量理论

社会质量(social quality)是近十年来发展起来的生活质量理念,这一理念的初衷是为了追求统一融合的欧洲大陆的建设。其定义是“公民能够参与到那些能够增加他们的幸福感并发挥出他们的潜能的社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程度。”^③社会质量包含四个维度:社会经济安全程度(The degree of socio-economic security)、社会融合程度(The extent of social inclusion)、隔代间的社会凝聚和团结程度(The strength of social cohesion and solidarity between and among generations)、公民的自主性和增权水平(The level of autonomy and empowerment of citizens)。总的来说,社会质量在福利概念上并没有太多新的突破,而是将之前的社会凝聚、社会排斥和人类发展概念整合在共同的政策层面之下,成为目前涵盖面最广的生活质量概念。

^① Lond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ission. London's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2008 – 2009 Report, 2009, pp. 8-9.

^② HH. Noll, “Towards a European system of social indicator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system architectur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2(58), pp. 51-52.

^③ W. Beck, L. van der Maesen & A. Walker, *The Social Quality of Europe*. Bristol: The Policy Press, 1998, p. 3.

社会质量的概念目前正在发展之中,还不是一个十分完善的理论。设在荷兰的欧洲社会质量研究基金会(European Foundation on Social Quality)是目前较大的研究社会质量的专业机构之一,致力于推广社会质量的概念和社会质量指标体系,已经在欧洲多个国家推广了社会质量指标。

生活质量理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目前影响较大的几种理论来看,都不再是仅仅局限于个人或者社会层面的福利,而是囊括了更广泛的内容,通过吸收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社会凝聚等理念将人类本身的发展与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其意义和功能也经历了从原本用于检测个人福利状况到现在的作为社会政策制定依据的变化。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质量的理论还会不断得以更新与发展,并通过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这类应用性研究来推动人类本身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从国外生活质量研究与实践的走势看,这一研究领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二、国外生活质量评价研究与实践

当前各种理论指导之下的生活质量研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推进,在不同的研究理念下出现了诸多形态各异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虽然这些生活质量评价指标大多只能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使用,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具有较强学术影响力和实践影响力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可以为我国生活质量综合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很好的借鉴。

(一) 国际层面生活质量评价研究与实践

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

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的,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en领导的专家小组根据当代人类发展的基本理念设计。它被用于衡量联合国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对传统的GNP指标挑战的结果。人类发展指数由三个指标构成: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人均GDP的对数。这三个指标分别与人的健康水平、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相关。首先,健康水平用出生时预期寿命来衡量;教育水平用成人识字率(2/3权重)及小学、中学、大学综合入学率(1/3权重)共同衡量;生活水平则用实际人均GDP(购买力平价美元)来衡量。自1990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都发布世界各国的人文发展指数(HDI),在世界许多国家或地区颇有影响,是世界最通用的指标体系之一。